学术专论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郭文忠

[摘要]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关键词] 清朝　乾隆帝　哈萨克　阿布赉　使者　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6）－01－0028－11

十八世纪初，伴随着清朝与准噶尔部交往的日益深入，清朝对位于准噶尔以西、亚欧大陆中部的哈萨克汗国诸部有了初步印象。在乾隆朝中期出征准噶尔部过程中，清朝对于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军事实力有了初步了解，并开始互派使者，正式来往。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成为哈萨克三部中最早与清朝通使的首领。随后哈萨克其余右西①二部首领②陆续遣使，与清朝建立正式交往关系。③对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进行考察，无疑是研究双方交往关系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以往虽对清朝与哈萨克早期交往有所涉及，④但所据核心史料多为《清高

[收稿日期] 2015－10－12
[作者简介] 郭文忠（1978－），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gwzwesley@126.com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10301-01500202）。

① 本文采用清代官方记载，称哈萨克三部为“左、右、西”部，分别对应于准噶尔西北、西南和以上两部以西地方的哈萨克三大部落。哈萨克和俄罗斯文献称此三部为中玉兹、大玉兹和小玉兹，清朝在交往初期曾将右部哈萨克称为西哈萨克，后逐渐固定为：左部＝中玉兹，右部＝大玉兹，西部＝小玉兹。野田仁曾就清朝对哈萨克三部称呼作过研究，见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ハン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年，第 119—148 页。

② 左部当时由苏丹阿布赉统领，右部名义上由阿布勒班毕特汗，实际上由头目图里拜等统领，西部由阿布勒海尔汗家族统领。

③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56—160 页。

④ 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各帐及其草原的述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摘译稿，1975 年油印本；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佐口透：《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兹特拉金：《准噶尔汗国史》，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年；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2001 年。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杨恕、王尚达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野田仁、小沼孝博，*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pecial Issue 1，University of Tokyo，2010；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辺境へ》，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 年；王荣：《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陈海龙：《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 1757—1822》，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以上研究均涉及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是以往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对本文具有参考价值，但在通使时间、使者其人、双方动机等问题上尚有进一步再探讨的必要。

宗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官修史籍和清代私人著述,[①] 并未充分利用满文档案史料，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尚不明确或尚待探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依据清代满文档案，并参考其他文献史料，着重考察清朝与哈萨克汗国诸部间首次通使全过程，并对若干具体问题详加考辨，以期有助于清朝与哈萨克汗国交往关系史研究。

一、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通使前的相互了解

在清朝出征准部前，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间并未正式通使。清朝早期对哈萨克有所听闻，尚属间接了解。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奏言："臣之与哈萨克构兵，非得已也。昔噶尔丹擒哈萨克头克汗之子，以畀达赖喇嘛，故头克使人乞臣关说，求还其子，与彼完聚。臣乃使人于达赖喇嘛，索得头克之子，拨五百人，护送归之，头克反尽杀臣五百人……哈萨克屡来犯臣，有如许过恶，臣是以兴兵而往。"[②] 可见与康熙帝同时代的哈萨克汗国头克汗，实力足以对抗准噶尔国汗策妄阿拉布坦，并与亚欧大陆诸势力相关联。头克汗于 1718 年去世后，哈萨克汗国形成大、中、小三玉兹分立局面。[③]

雍正七年（1729）清朝进征准噶尔时，派副都统满泰出使俄罗斯，并前往土尔扈特赏赐新汗策凌敦多布继位兼联络其部夹击准噶尔。满泰于雍正九年五月至土尔扈特牧地，恰遇哈萨克遣往土尔扈特和谈使者宰桑扎古斯塔（jagusta）。已有学者首先对此次会面进行了研究,[④] 但因解读满文档案有所失误，高估了会面意义。首先其称"满泰授予扎古斯塔雍正帝所颁敕书，希望双方能达成某种战略联合"，但此文书并非"敕书"。事实上满泰在抵达土尔扈特后，方才听闻哈萨克与土尔扈特邻近且与准噶尔接壤，为不令哈萨克因消息闭塞受惊扰而临时起意撰写文书。[⑤] 其次认为此时扎古斯塔表明了"哈萨克汗国希望与清朝能够直接通使通贡的意愿"，但据原文"假如道路已通，我方诸汗业已向大博格达汗请安矣，待（大博格达汗）灭准噶尔后，我等皆将领受大博格达汗之恩典也"[⑥]，可见在扎古斯塔看来，"请安"与"领受恩典"等行为，都需要"道路已通"即清朝已攻灭准噶尔汗国后才可能实现。而这一必要条件在当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哈萨克无能力也无意于此时遣使请安。结合满泰出使土尔扈特全部三份满文奏折[⑦]内

---

① 《钦定新疆识略》《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朔方备乘》《西陲要略》《筹办夷务始末》《西陲总统事略》《啸亭杂录》《塔尔巴哈台事略》《伊江汇览》等清代撰述都涉及清哈首次通使，但所述多有不确，需要考订补遗。

② 《清圣祖实录》卷 188，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

③ 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第 60 页。

④ 赵卫宾：《哈萨克与准噶尔政治关系史研究：1680—1745 年》，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36—40 页；《清与哈萨克汗国首次外交会晤考—兼议使臣满泰生平》，"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2015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论文集，北京昌平，2015 年 10 月，第 477—483 页。

⑤ 满文转写：celing dondobde, urgun i doroi kesi isibume, jaka šangname unggire ubade isinjifi, donjici, suweni hasak gurun turgut de hanci bime jungar i emgi jecen acahabi sembi, meni gūnin de, meni gurun i amba cooha ere aniya dailame dosimbi, coohame dairangge jun gar, tesei emgi acame tehe suweni hasak i niyalma turgun be sarkū de balai jobome aššarahu seme, be emu bithe unggiki sembihe。

⑥ 满文转写：aika jugūn hafufi, meni han se aifini amba bokda han i elhe be baime yabumbihe, jungar be mukiyebume manggi, be gumu amba bokda han i kesi be alime kai sehe。

⑦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 册，244—248 页，出使土尔扈特副都统满泰奏闻到土尔扈特地方致书哈萨克汗等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 册，出使土尔扈特副都统满泰奏噶尔丹策零之弟罗卜藏舒努等派遣使臣以表投顺之意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第 248—260 页。《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 册，出使土尔扈特副都统满泰奏闻出使土尔扈特情形折，雍正十年三月初五日，第 261—269 页。

容可见，雍正九年的这次会面实为满泰单方面向扎古斯塔告知清军征准行动，目的为不惊扰哈萨克游牧，并无联合哈萨克夹击准噶尔的战略意图；而扎古斯塔并未负有联络清朝使命且身份低微，[1] 会面时仅只领受文书，未表示军事配合清朝征准行动，亦未承诺通使通贡。

雍正十二年清廷与准噶尔和谈议界时，谕令清使者以哈萨克军力作为游说噶尔丹策零之凭据："哈萨克、布鲁特等敌国，乘隙屡屡侵扰，则焉能保尔属乌合之众，一心不二，死命效力于尔耶。"[2]

乾隆初年（1735），准噶尔逃人带来哈萨克与准噶尔连年对战的消息："前年哈散克[3]来喫准噶尔达赖台吉，抢了一半人折了；去年哈散克又把额尔科图喫了八十家；今年哈散克又把准噶尔许多马匹赶着去了。"[4]

从康、雍、乾三朝准噶尔汗奏言、清大臣奏折、清廷谕令及准噶尔逃人供言等资料可见，哈萨克汗国拥有较强军事实力之情状，已为清廷知悉。但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十九年长达五十余年里，清廷虽获得越来越多有关哈萨克的消息，并有过一次接触，清使者却从未到达哈萨克，哈萨克使者也未来过清朝，即双方并未达成通使。对哈萨克内部情形，清廷尚缺乏详细情报。

随着清廷于乾隆二十年（1755）出征准噶尔，有关哈萨克的信息开始出现于前线将领的奏折中，如"去年十月内，巴特玛车凌、额林沁、阿布赉带领厄鲁特、哈萨克兵一万有余，将博尔塔拉等处所有游牧人众尽行抢掠"。[5] 哈萨克首领阿布赉以其军事影响力，正式进入清朝视野内。清廷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前线将军："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处安插，不必迁移。倘径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6] 显然，清廷对哈萨克最初政策极为宽松：来归则厚遇之，反之亦不用兵。只要哈萨克能安分守己，清廷就可腾出手来处理更为紧要的平准事务。

此时清廷获得哈萨克信息的主要来源，为乾隆十九年归附清朝的阿睦尔撒纳。他因与哈萨克中玉兹苏丹[7]阿布赉关系密切，在归附后主动提出遣使哈萨克。[8] 乾隆帝对其极为重视，于当年十一月召见于热河，亲自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9] 在随后的清朝与哈萨克交往中，阿睦尔撒纳本人，及其遣往哈萨克左部阿布赉处使者丹津央金、遣往哈萨克右部使者特古斯穆彰阿，其留驻哈萨克属人额林沁、巴特玛车凌，均深刻影响了清哈交往进程。

哈萨克在通使前对清朝的了解，主要通过准噶尔获得。与精通蒙古语的乾隆帝类似，阿布赉本人掌握卫拉特语，[10] 对蒙古语言的熟悉，使清哈双方往来拥有通用语言。哈萨克在归附后仍使用托忒文字向清朝行文，更说明准噶尔因素在双方沟通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乾隆二十年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及清使者丹津的表述可知，阿布赉等人在清军进兵准部初期就已了解到清朝无用兵哈萨克意图，"又闻大皇帝仁恩，不向我处行战事，使生灵安逸，甚为喜悦"；并对清朝

---

① 扎古斯塔接受满泰文书后，"叩头不止"（emdubei hengkišeme）。

② 赵令志、郭美兰：《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822 页。

③ 原汉文录副如此，应为"哈萨克"之近音异写。

④ 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乾隆元年八月十五日，档案号：03－0522－016，陕西固原提督樊廷等奏。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9，乾隆二十年三月丙午。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8，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⑦ 亦有研究称阿布赉于 1735 年已是哈萨克中玉兹汗，到 1743 年成为哈萨克三玉兹汗，见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第 324 页。但多数研究认为阿布赉于 1771 年登汗位，如佐口透：《18 — 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第 343 页。瓦里汗诺夫则称阿布赉在 1762 年仍是苏丹，见瓦里汗诺夫：《阿布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摘译稿，1979 年油印本，第 153 页。综合史料来看，此时阿布赉尚为中玉兹苏丹较为可信。

⑧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5，乾隆二十年一月辛卯。

⑨ 昭梿：《啸亭杂录》卷 3《西域用兵始末》，中华书局，1980 年，第 76 页。

⑩ 克拉拉·哈菲佐娃：《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杨恕、王尚达译，第 245 页。

进兵准噶尔的初期表现有所耳闻，“此次（大汗）在准噶尔地方行战事而来，不杀一人，不拿一物，实在令我们赞叹喜悦”；① 阿布赉还结合自身游牧经济特点，表达了与清朝进行贸易的强烈意愿，“其余马匹想求得和睦相处后在彼处出售，以购买各种商品带回”。② 哈萨克获得如此详细的关于清朝的情报与信息，还可在其后的档案史料中得到证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阿布赉归附清朝时所遣哈萨克使者霍托桂达木在清军军营观看骑射演练后，向富德等言及哈萨克亦有骑射技艺，又言及阿睦尔撒纳曾向哈萨克人提及清军使用右手骑射就已困难，反手骑射更无法做到，今日亲眼得见清军骑射屡屡以左手放箭命中目标，诚然技艺高超。③ 言外之意，阿布赉部众曾经从阿睦尔撒纳处听闻有关清军骑射战斗力强弱的详细情报。哈萨克通过准噶尔获得对清朝军力等情况的认知，由此可见。

二、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过程

清朝与哈萨克通使交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侍卫顺德讷出使哈萨克归来，被学界公认为是双方第一次正式会面。④ 他于七月二十八日到阿布赉处，十月十六日返回博尔塔拉被阿睦尔撒纳扣留，获释后于十二月十七日回到清军军营。⑤

对阿布赉首次归附口信内容，学界有不同研究结论。苏北海在《哈萨克族文化史》中，认为《朔方备乘》卷六《哈萨克内属述略》记载阿布赉言与清朝使者：“向闻大皇帝临御中土，以山川之故，贡驿未通。今天威远播，扫伊犁、兴黄教，俾与准夷俱庆升平，实无疆之福，敢以诚心，归于德化”，是哈萨克阿布赉最早表示归附的口信。这一记载不见于《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且未说明是哪一批清使者出使时阿布赉所言，或是否综合了几次口信。清朝这次所遣使者为何人成为问题关键，经笔者查证《朔方备乘》，⑥ 在这段话前有“乾隆二十年二月，准噶尔平，诏遣使往谕，阿布赉言与使臣侍卫顺德讷、达勇阿曰”，由此可知《朔方备乘》这段记载即《清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所见顺德讷、达永阿出使哈萨克之事。

然而清人何秋涛（1824—1862），并未利用清宫满文原档，因史料所限，所述多有不确之处。笔者考证军机处满文档案，其所记顺德讷、达永阿，并非同时出使，而是出发有先后；⑦ 乾隆二十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4－1423－004，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所言阿布赉口信。按：本文所引满文录副译文，皆为笔者自译。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档案号：03－0174－1423－008，参赞大臣阿兰泰等奏，清使者丹津央金转述阿布赉向其所言。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档案号：03－0176－1643－011，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奏。

④ 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第319页；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第328页；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15世纪—20世纪中期），第99页；野田仁、小沼孝博：*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 *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pecial Issue* 1, University of Tokyo, 2010, pp. 94－95；小沼孝博：《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游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辺境へ》第六章《清とカザフ游牧势力の接触》，第163页。以上研究持相似结论，认为顺德讷为清朝最早出使左部哈萨克使者。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24，乾隆二十一年正月辛未。

⑥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6，《哈萨克内属述略》。

⑦ 详情见于：《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1，乾隆二十年五月辛巳；《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4，乾隆二十年六月甲子；《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24，乾隆二十一年一月辛未；《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21，乾隆二十年十一月戊寅；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174－1445－005，定北将军班第等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二日，档案号：03－0174－1444－003.2，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年至二十一年，两人各有过两次单独出使哈萨克经历,① 何秋涛所记，实融数次出访于一次。乾隆帝谕令遣使哈萨克时间，亦非二十年二月，而是五月。② 且其所记阿布赉所言，并非独言与顺德讷、达永阿，而主要是阿布赉向丹津央金所言,③ 其内容亦为阿布赉数次口信综合加工而成。

综上所述，包括《朔方备乘》著者何秋涛在内，从清代到今天，国内外绝大多数研究限于史料，基本上都判断顺德讷这次出访阿布赉处为首次且给清朝带来了阿布赉口信，但这一结论有待订误，以下笔者就此展开探讨。

（一）与左部哈萨克的首次通使

顺德讷出使哈萨克原因，见于乾隆二十年五月上谕。④ 清廷认为遣使哈萨克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两路大兵已经会合，奏功指日可成。朕意，此时正宜遣人往谕哈萨克”。清廷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善后事宜后，解决哈萨克袭扰问题变得愈加迫切，因而决定主动遣使。相比三个月前的宽松政策，清廷此时提出“须各守边界，不得妄行出境掠夺准噶尔人”的具体要求，并对哈萨克发出“倘不谨遵谕旨，必发大兵征剿”的战争威胁。

这道上谕办理情形如何？以下满文档案回答了这一问题：

> 臣班第、阿睦尔撒纳、萨喇尔、额林沁多尔济、鄂容安⑤谨奏……乾隆二十年六月初六日奉上谕：著寄谕班第等，今勘定准噶尔全境，唯哈萨克因与准噶尔曾有战事，故仍入境妄自劫掠，致使准噶尔人众不得安宁。现今准噶尔地方及人口皆归于我朝，哈萨克若仍旧妄自劫掠，则断然不可。故此，朕先前业已降旨，派人赴哈萨克晓谕。著班第等遵照朕先前所降谕旨往哈萨克派人……再，先前阿睦尔撒纳又为此派人⑥探听伊在哈萨克地方其兄巴特玛车凌消息……⑦
>
> 臣等钦遵训谕，遣使往哈萨克阿布赉等处赍送敕谕……臣阿睦尔撒纳首次所派使者丹津央金预计将于今晚或明日返回……

由该奏折可见，清廷继五月谕令遣使哈萨克后，再次于六月六日寄谕催督。班第等将丹津央金称为已派往阿布赉处使者，判断其将于当晚或次日返回。

丹津央金是由定边左副将军、双亲王阿睦尔撒纳派往哈萨克阿布赉处，且以使者身份出现在包括最高指挥官班第在内、全体前线将领共同署名的奏折中。加之班第随后派侍卫达永阿出使哈萨克时，亦遵循丹津出使时特授顶戴花翎成例：“先前将阿睦尔撒纳之宰桑丹津派往哈萨克地方寻找巴特玛车凌、额林沁时，阿睦尔撒纳、额驸色布腾班珠尔共同商议后，赏给丹津顶戴花翎……查得，此举对威武送旨之事甚有益处”。⑧ 由此可知，丹津央金的使者身份即为班第等将领所认可，出使时又戴用顶戴花翎，作为清使者的合法性是完全具备的，为何丹津央金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原因应为：

首先，丹津央金这一全名，以及他从哈萨克带回阿布赉口信及出使情形，未载于官修史籍中。未收录原因应为史籍纂修官员判断事关丹津央金满文奏折价值较低，因而未予采用。其次，班第与阿睦尔撒纳同处伊犁军营，日见其叛迹明显，遂接连以密折报告其作恶行为，阿睦尔撒纳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28，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己卯。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1，乾隆二十年五月辛巳。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4－1423－004，定北将军班第等密奏。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1，乾隆二十年五月辛巳。

⑤ 具奏五人均为当时驻伊犁军营大臣，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额林沁多尔济为喀尔喀和硕亲王，鄂容安为西路参赞大臣。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二日，档案号：03－0174－1423－008，参赞大臣阿兰泰等奏。此处阿睦尔撒纳所派使者丹津央金，在其后奏折中简称为丹津。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174－1445－005，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十二日，档案号：03－0174－1444－003.2，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属人丹津央金，亦被视为不可信，进而影响记载。

但事实上从哈萨克首领阿布赉看来，即使阿睦尔撒纳随后叛清，丹津央金依然代表清朝，这为阿布赉向他表达了归附清朝意愿，及丹津央金返回时，派出哈萨克使者至清军军营请求前往京城入觐所证明。因而，虽然汉文史料记载不清，但综合满文史料中清朝与哈萨克两方面表现来看，丹津央金作为最早代表清朝出使哈萨克阿布赉处的使者身份确定无疑。

笔者所见另外一份满文密折,① 即包括此次丹津央金带领哈萨克使者回到军营后，班第等询问详情:②

> 丹津我于五月二十二日至哈萨克阿布赉处，向其言阿睦尔撒纳、班珠尔带来大汗③五万军队和我们卫拉特一万军队，平定并驻居准噶尔地方等语，阿布赉闻言甚悦……随即将丹津（我）与阿布赉之人火速派出。阿布赉先前为使阿睦尔撒纳知晓此等缘由，已遣大头目哈伊巴汗④及如阿穆尔⑤二十二人⑥……
>
> 询哈萨克阿穆尔巴图鲁，告称丹津到来前，已听闻阿睦尔撒纳带来大国之军，成准噶尔地之汗，又闻大皇帝⑦仁恩，不向我处行战事，使生灵安逸，甚为喜悦。我等已集结军队，准备派出与准噶尔作战，听闻大国之军到来消息，遂将军队皆遣散，使各返游牧地。正查看彼等卫拉特人畜，各得分拨返回时，额林沁叛变而出，杀三十余人……我处人众早已听说大汗仁恩威名，甚有敬慕之心，但不能通晓得享。此次（大汗）在准噶尔地方行战事而来，不杀一人，不拿一物，诚令我等赞叹喜悦。我处阿布赉追赶额林沁时，派使者携礼物去见大汗之人，以求得安宁之福。因已赶不及，返回游牧地后，我（阿布赉）想若得特派使者，由阿睦尔撒纳带去觐见圣主英明，我甚为愿意领受大皇帝之恩，瞻仰大皇帝……

这份密折内容为丹津告知阿布赉清军业已平定准噶尔后，阿布赉首先将额林沁叛离哈萨克之事相告，复谈及曾遣使携礼物追赶清军，随后遣使者阿穆尔随丹津前往伊犁。丹津带领阿穆尔见到将军班第后，两人分别述及阿布赉言行及其遣使入觐请求。该份档案中，第一次出现了清朝前线官员与哈萨克使者直接交流的详细记录。

由该份满文奏折形成的官修史籍记载，极大影响到以往清哈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因而有必要进行横向比对。笔者遂考证与其对应的《平定准噶尔方略》和《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年八月乙卯条记载。

在《平定准噶尔方略》题名《定北将军班第等疏奏哈萨克通使情形》中，包括班第对清廷七月初五日上谕的复述、疏奏，以及清廷对此所颁新上谕三部分内容。将《方略》与满文奏折对比，可见《方略》疏奏部分至少综合了班第七月二十五日密折及班第对七月初五日上谕的回复奏折等两份奏折的内容。这反映出《平定准噶尔方略》撰修过程中史官不但对原始材料做裁剪和概括处理，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4－1423－004，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② 这段史料在《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6，乾隆二十年七月乙卯条内有部分记载。

③ 此处满文转写为：amba han，直译为“大汗”，特指乾隆帝。

④ 此处满文转写为：ambakan data haibahan。

⑤ 与上文所述阿穆尔巴图鲁应为同一人，即阿布赉此前已经向清军派出像阿穆尔巴图鲁这样的使者二十二人。因其时哈萨克游牧社会有巴图鲁官职，及两处称呼不同可知，此哈萨克使者名应为阿穆尔，巴图鲁是其官职名或称号。

⑥ 这二十二位哈萨克使者都未见于清朝史料记载，应为阿睦尔撒纳截留。

⑦ 满文为：amba ejen，本意为大额真，清代多译为大皇帝。此处是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自述，应为当时哈萨克内部与“amba han”（大汗）并存的对乾隆帝称呼之一。笔者从此份1755年的满文奏折出发，认为因此次清朝官员与左部哈萨克使者的最早直接交流中，统一称呼己方乾隆帝为：“amba ejen”，导致哈萨克吸收这一满语词汇，进而改变了此后对清朝皇帝的称呼。小沼孝博考察了1757年至1820年期间，哈萨克各部首领致清朝的16件托忒文和察合台文文书，发现哈萨克对清朝皇帝沿用“ejen”（额真）这一称呼，见：野田仁、小沼孝博：*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pp. 86－125。

且有拣选几份奏折内容于同一疏奏下的做法。在疏奏内容上则对哈萨克使者前来情形做了大量删减，对使者仅有“辞意极为恭顺”一句记录，甚至未提及遣使之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在新上谕中，仅提及班第当时应向哈萨克使者言说“阿布赉诚心钦附，恭顺可嘉”，并无班第或清廷直接态度的记录。而《清高宗实录》则完全略去复述和奏疏，仅收录新上谕。比较满文档案与《平定准噶尔方略》和《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可见后二者是对原奏折内容的高度概括，仅有使者前来之信息，而至关重要的清、哈使者自述及阿布赉口信全未收录。正是史料获取的不充分，导致包括佐口透①在内，学界长期以来对丹津央金和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的重视不足。

对清廷及定北将军班第应对阿布赉遣使一事时的具体考量，亦有重新梳理的必要。将军班第在收到追回阿睦尔撒纳并相机办理的上谕后，接见了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并派其追赶阿睦尔撒纳，并于七月二十五日发出报告哈萨克使者情形的密折。之后，为避免将阿睦尔撒纳召回军营办理会惊吓到哈萨克使者，班第遣人将先前派往召回阿睦尔撒纳之人星夜追回，并就调整计划情形再次具奏。乾隆帝随即给出对应这两份奏折的新上谕。② 乾隆帝在新上谕中认为班第错失良机，本应令哈萨克使者直接入觐。实际上这次阿穆尔巴图鲁入觐未能成行，即受阻于阿睦尔撒纳。据丹津其后所言：“我等在莫特海卡尔甘之地追赶上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询问使者后，并不向京城派出，而向哈萨克派回”。③ 将军班第在处理阿布赉来使入觐请求时缺乏决断，使清哈间错失建立早期联系机会，间接使得哈萨克归附清朝时间，推迟了两年。

这份档案的价值还在于记录了哈方使者带来的阿布赉等人口信，④ 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其中，阿布赉等清楚表明哈萨克与清朝交好的愿望：“我甚为愿意领受大皇帝之恩，瞻仰大皇帝”；作为双方还未发生直接政治、军事接触的阶段，阿布赉就主动遣使携礼，求见乾隆帝，足见其想要与清朝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强烈意愿。虽然遣使往追未获成功，但在见到清使者丹津央金后，阿布赉立即表达先前遗憾，“返回游牧地后，我想若得特派使者，由阿睦尔撒纳带去觐见圣主英明”，并马上付诸行动“将丹津与阿布赉之人火速派出”，⑤ 很快向清朝派出第二批使者阿穆尔巴图鲁。

阿布赉与清朝积极交好有何直接意图？参赞大臣阿兰泰约一个月后讯问丹津的满文奏折补充了此次出访的关键细节。

> 有名为丹津之人，先前所奏曾遣往哈萨克……丹津供称……我到哈萨克与台吉阿布赉、以及扎坎、额色伯伊、哈德尔、拜木尔扎等众人相见……尔等言：现在大皇帝军队到来，将汝等卫拉特蒙古收拢治理，你我已被分开，我等何敢敌对生事。我等现将赶一万匹马到将军大臣处，除进贡伯勒克马匹，其余马匹想求得和睦相处后在彼处出售，以购买各种商品带回，我等族众甚为喜悦，等语。丹津又言：正将一万匹马、一千人派出时，进入哈萨克之辉特台吉额林沁突然行动，杀哈萨克五十余人，向此处而来。阿布赉带领两千军队征讨额林沁……⑥

这份奏折包含未被将军班第询问具奏的重要细节，阿布赉主动遣使清朝的目的进一步明朗。阿布赉早有先行进贡伯勒克马匹求得和平相处后，进而与清朝贸易的明确意图，阿布赉已经组织

---

① 学界以往研究知阿穆尔巴图鲁前来，但不清楚其明确目的，实因缺乏以上详细信息。如佐口透注意到阿穆尔巴图鲁：“是哈萨克统治阶级派到伊犁地方当局去的最初通好的使者”，但未能理清这一阶段清哈交往发生之细节，如阿穆尔巴图鲁已是阿布赉所遣第二批使者，之前阿布赉就曾遣使携礼求见但未能追及等情，因而对阿布赉归附意愿估计不足，对阿布赉此时就欲与清朝进行贸易之事则完全未涉及。见佐口透：《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第 318—319 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6，乾隆二十年八月乙卯。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档案号：03－0174－1423－008，参赞大臣阿兰泰等奏。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4－1423－004，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0174－1423－004，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档案号：03－0174－1423－008，参赞大臣阿兰泰等奏。

好大规模贸易商队，只因额林沁变乱而被迫中止。从阿布赉为与清朝贸易采取的切实行动可见，其后百年清哈绢马贸易的开展，此时已初露端倪。

丹津言说阿睦尔撒纳带来大皇帝和卫拉特军队平定准部，应出于阿睦尔撒纳授意，以其将治理准部为辞。但阿布赉并未被蒙蔽，他不但将使者派向清军军营，还要求建立直接联系，再结合其亲言“现在大皇帝军队到来，将汝等卫拉特蒙古收拢治理，你我已被分开”可见，阿布赉此时已经清醒认识到清朝将要直接治理准部之意图。此外，从阿布赉接连两次遣使携礼求见之行为，及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愿领受大皇帝之恩，瞻仰大皇帝”之恭顺言辞，可以肯定阿布赉有归附清朝的强烈意愿。这一点亦为将军班第所察觉：“闻哈萨克之人所告……虽有丹津生事，哈萨克又如此愚钝糊涂，尚属可信，喜悦之情真切”，① 即前线最高级别将领班第经过与哈萨克使者的首次交谈和接触，已经给予哈萨克难得的正面评价，并将影响到清廷对哈萨克政策的制定。

（二）与右西部哈萨克的首次通使

西哈萨克②即“右部哈萨克，东去左部二千里，北界俄罗斯界，西南至塔什罕”。③ 由于距离准噶尔汗国最近，长期作为附属国被其统治。以上所引班第奏折中，有“再，亦往布鲁特遣使晓谕”④ 的奏言，实为遣使布鲁特与西（右部）哈萨克。笔者所见班第于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具奏，即为清使者特古斯穆彰阿出使右部哈萨克及返回详情：

> 特古斯穆彰阿告称，我前往古尔班和卓处，将事由相告后，古尔班和卓甚为喜悦，随即送我至塔什干城，与哈萨克达塔⑤会见。哈萨克众达塔聚集后……将使者卓过七里、铁木尔真二人与古尔班和卓使者多伯过，及由我处派驻塔什干德木齐卓甘一同派出……
>
> 将哈萨克使者带来文书译出内开：吐里拜、辉格尔德、特柳克、萨萨克拜、哈图拜、彰各拜、魁索莫斯⑥呈递。先前噶尔丹策零时期，我们三鄂托克⑦人众并不敌对，安逸生活。后四卫拉特交恶，互相攻杀，征伐动乱，也将我等劫掠。当逃亡者来告时，我等派军队迎战互攻，亦将彼等游牧劫掠，和彼等成为敌对。至今为打仗，人皆不下马。现使者前来言汝等居旧游牧，我等甚为喜悦，想来或成噶尔丹策零时之势。求各返原游牧地，将塔什干城驻扎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174－1423－005，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② 笔者认为，该奏折中班第所使用满文“wargi hasak”，在军机处被汉译为“西哈萨克”进入汉文史籍，该部称呼其后又演变为“右部哈萨克”，体现了满语一词多义现象和清廷对哈萨克三部认识的逐步深入过程。因满语中“wargi”一词兼有“西”与“右”二义，清廷与之接触初期，以“西哈萨克”译之，其后了解到哈萨克三部分别位于准噶尔西北、西南和以上两部以西地方。遂将位于最西一部（小玉兹）称作“西部哈萨克”，而将此处所称“西哈萨克”（大玉兹）改称“右部哈萨克”。

③《西域图志》卷 44，《藩属一》，“右部哈萨克”条。见钟兴麟等：《〈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174－1445－005，定北将军班第等奏。

⑤ 达塔：系满文转写“data”之音译，满文中“da”为头目之意，“ta”为复数后缀，因而在满文中出现“data”一般指众头目。但笔者所译档案中满文“ambakan data haibahan”（大头目哈伊巴汗）用法，明显指一人，即“data”在此用作单数指头目，与满文“data”通常作复数“众头目”之意并不完全一致，且由于此两份满文档案中出现“data”一词时，都为转述。因而，笔者遂考证单词“datkha”（داتقا）< 名词 >［波］{旧}（卡克西·海尔江著：《词库》（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103 页）认为，特古斯穆彰阿所转述旧哈萨克语“datkha”，被在伊犁的清朝随军笔帖式音译为具有众头目之意的满文“data”而记录下来。此词的实际意义是指，“特定存在于当时哈萨克以及中亚社会中，在汗和部众之间，起到沟通作用的部落头目”（哈萨克文翻译感谢阿尔深·阿拜）。除此处右部哈萨克使用达塔这一官职名，“达塔”一词亦出现于清朝使者丹津央金转述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原话中，可见达塔与巴图尔（巴图鲁）类似，为当时哈萨克各部通用官职名。

⑥ 此七人为右部哈萨克（大玉兹）头目，相比《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中最多列此七头目中前四人之名，此处出现最全。

⑦ 此处三鄂托克系满文“ilan otok”，但因此词系译自哈萨克信件，实应指哈萨克三部大、中、小三玉兹。

> 之阿齐木、哈尔罕取消，汝等居中搅合，两边生事。从今往后，为互相和好而派遣使者，甚好。
>
> 为知晓使者口信，向铁木尔真询问，其言与文书相近……臣等向尔等使者铁木尔真言，尔等达塔若欲前来相见，即可前来，如愿受圣主恩典，前去瞻仰大皇帝，派使者请安进贡之处，彼等到时，议定上奏。塔什干驻扎阿齐木、哈尔罕，乃从前旧制，不可取消。至若先前所派之人为恶，可另换派好人等语。如此明白告知，并将先前给哈萨克等之敕书颁给……①

清使者特古斯穆彰阿到达布鲁特古尔班和卓处后，被其送至塔什干城会见西（右部）哈萨克众头目，随后带领西哈萨克使者铁木尔真回到伊犁军营。班第等翻译西哈萨克七位达塔联名信件后，得知西哈萨克听闻准噶尔战事结束甚喜，并请求撤销征税官，此后遣使通好。将军班第以宗主国身份言明旧制不可取消，同时颁给乾隆帝敕书，告知若西哈萨克头目入觐朝贡将代为上奏，并赐予缎匹茶叶。西哈萨克使者铁木尔真，最终带着敕书和赏赐返回。班第随后遣侍卫章武前往招抚西哈萨克，此举获得乾隆帝肯定。②

此次清朝与西（右部）哈萨克间包括书信呈递、宗主权行使、敕书颁赐在内的通使活动，为双方首次正式往来。学界以往研究，多以乾隆二十三年（1758）七月十六日③右部哈萨克归附，为双方通使之始。而这件档案，可将双方首次通使时间提前三年。

西（右部）哈萨克来使铁木尔真带到清军军营的信件，由七位达塔联名呈递。这一联合署名说明，当乾隆二十年不晚于七月④清朝使者特古斯穆彰阿到达西哈萨克时，他们召开了由众达塔参加的部落大会，该信件代表了西哈萨克的共同决定。信件内文中，表达了对残酷战争的厌恶，及对清朝平息战乱的感激，对和平的向往使他们提出了“派遣使者，互相和好”的请求，并以属国身份请求取消征税官。当时阿睦尔撒纳未叛，道路基本畅通，铁木尔真能够安全返回。图里拜等接到清廷敕书后，即可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乾隆帝的对哈政策。

西（右部）哈萨克于三年后正式归附清朝，富德奏折中再次出现西（右部）哈萨克众头目名字：“询知右部哈萨克头目吐里拜、辉格勒德、萨萨克拜等，俱在塔什罕城与回人争战，特柳克已经病故……十六日，阿比里斯等集众来见，告称我右部哈萨克久欲归诚……我等欣闻招抚，情愿入觐。”⑤ 彼时，西哈萨克（右部哈萨克）汗权⑥衰微，实权握于众巴图尔之手。见《西域图志》：“右部哈萨克……其巴图尔有三，曰吐里拜，曰辉格尔德，曰萨萨克拜。阿比里斯驻塔什罕城，不事事，受成而已，惟吐里拜实专其政。”⑦ 清朝此时遣使，及右部哈萨克召开部落大会派使者至清军营获颁敕书，对右部哈萨克来说尤其珍贵，使得他们在第一时间对清朝有了直观印象。三年后，参加这次部落大会的各巴图尔（达塔）中除特柳克病故外，掌握西哈萨克实权之吐里拜、辉格勒德、萨萨克拜尚在。他们能在彼时即刻臣服，固然有对清军战力认可及左部阿布赉臣服垂范因素的影响，但这次使者往来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时所言“久欲归诚”可为旁证。

---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二日，档案号：03－0172－0448－001，定北将军班第等奏。该份档案部分内容见于：《清高宗实录》卷496，乾隆二十年九月壬申；《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7，乾隆二十年九月壬申。但《实录》、《方略》记载失之过简。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16，乾隆二十年八月乙卯。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6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

④ 该奏折发出日期是八月十二日，除去特古斯穆彰阿在西哈萨克塔什干城逗留，及返回伊犁行路时间，特古斯穆彰阿到达西哈萨克时间应不晚于七月。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61，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庚寅。

⑥ 此处右部哈萨克即西哈萨克，据《新疆识略》卷12《哈萨克世次表》，阿比里斯为原中玉兹汗王阿布勒班毕特次子。

⑦ 《西域图志》卷44，《藩属一》，“右部哈萨克”条。

西部哈萨克（小玉兹），位于左右二部以西，邻近里海，与清朝通使最晚。《新疆识略》称其为“西部”，“其西部额勒里汗、弩喇丽汗处极西，为最远”。[①]《朔方备乘》谓其“北哈萨克”，“至北哈萨克一部，距中国最远……其部当俄罗斯东俄南俄之中路，通莫斯科窪仅三千里程，实为俄罗斯腹心大患，故长宿重兵以防之”。[②] 因西部哈萨克与清朝相隔左部，加之阿布赉长期代表哈萨克三部与清朝交往，因而清朝得知西部哈萨克，始于阿布赉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归附后向清使者顺德讷所言，“我等哈萨克，有三部落，我系鄂尔图玉斯头目，奇齐玉斯、乌拉玉斯，皆我族兄为长”。[③] 奇齐玉斯为哈萨克语小玉兹之意，即西部哈萨克。虽然西部哈萨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年底派额呼里进兵吹、沙喇伯勒等地抢掠准噶尔策楞等部，并与清军接触，[④] 却并未通使。至乾隆二十八年正月，西部哈萨克才经伊犁将军明瑞奏请[⑤]后遣使者乌克巴什颇拉特首次入觐，获颁敕书，“汝远在遐荒，未通朝命……念汝游牧之地甚远，初通贡使，赏赉特优”。[⑥] 再由明瑞奏报时称“左部哈萨克努尔赉遣使入觐”，及敕书“赐右部哈萨克奇齐玉斯努尔里”等表述可见，清廷至此时仍未将西部哈萨克与左右部哈萨克区分开。西部哈萨克因相隔遥远，又面临俄罗斯吞并威胁，因而与清朝通使最晚。

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乾隆帝与哈萨克汗国诸部首领的重视，引发双方首次通使。清廷对哈萨克初期政策，从属于平准大局。哈萨克左、右、西部与清交往，则在于谋求生存与发展。清朝以平准为首务，对哈萨克并无征服意图；哈萨克游牧社会经历长期分裂战乱，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双方首次通使全过程，即发生于此背景下。清廷得知哈萨克归附意愿、贸易需求，哈萨克亦知晓清廷平准、定边政策，为双方后续交往奠定基石。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上谕中，乾隆帝首次降旨遣使晓谕哈萨克，并于六月初六日再度降旨催督。班第等虽遵旨依次派出侍卫顺德讷、达永阿等前往哈萨克，但首次成功代表清朝出使哈萨克左右部的使者，是此前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派出的丹津央金和特古斯穆彰阿。虽然阿睦尔撒纳企图借清朝名义遣使扩大自身影响，但阿布赉将戴用顶戴花翎之丹津央金当做清朝使者对待并遣使入觐，及班第向右部哈萨克使者行使宗主权、颁发敕书等事件，已使此次通使成为清朝与哈萨克左、右部间的正式往来。

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左部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在清朝使者丹津央金带领下，到达清朝伊犁军营，带来了阿布赉口信，表达了希望归附清朝，并由阿穆尔巴图鲁代其前往京城入觐的意愿。此次通使，还带来阿布赉曾经遣使携礼往追清军，希望与清朝交好，进而以上万哈萨克马匹交换商品进行贸易的信息。通过考辨新史料，可将清朝获悉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归附意愿时间，从以往主流研究认为的顺德讷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回到清军军营，提前到报告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到达伊犁密折发出时间七月二十五日前，约提前五个月。且报告哈萨克使者阿穆尔巴图鲁到来情形密折，于乾隆二十年八月十四日即奉朱批，从而使得清廷在第一时间掌握哈萨克内部情形及阿布赉与清朝交往的真实动机，进而直接影响清朝平准战争决策与清朝对哈政策。

---

① 松筠：《钦定新疆识略》卷 12《哈萨克世次表》。
②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6《哈萨克内属述略》。
③《清高宗实录》卷 543，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辰。
④《清高宗实录》卷 55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辛亥。
⑤《清高宗实录》卷 675，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丙子。
⑥《清高宗实录》卷 678，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丁卯。

清朝使者特古斯穆彰阿，于乾隆二十年六月初六日前从伊犁出发，约八月前见到右部哈萨克众首领，并于八月十二日前带领使者铁木尔真回到伊犁班第处。右部哈萨克在书信中表达出希望“派遣使者，互相和好”的愿望，将军班第代表清朝行使宗主权，答复书信中有关塔什干征税官的请求，并赐予使者乾隆帝敕书。此次通使，可以将学界以往认为的清朝与右部哈萨克通使时间提前三年。该信件上七位联名达塔中的多数，三年后仍握有右部哈萨克权柄，此次通使，为彼时哈萨克顺利归附清朝埋下伏笔。左、右部与清朝通使交往，引致五年后更遥远的西部哈萨克遣使入觐，并造成汉文史籍中“西哈萨克”一词所指改变。

乾隆帝对哈萨克情形掌握程度，及其对哈萨克态度，直接决定了清廷政策走向。清哈间首次通使，使乾隆帝获得了介入中亚地区的直接经验，形成了对哈萨克的基本判断。满文档案中所载哈萨克信息，正好吻合乾隆帝对哈萨克认识中未载于官修汉文史籍部分，为厘清史实提供了可靠依据。哈萨克汗国左右部在清哈交往初期，即表现出与清朝交好的强烈意愿，获得清廷赞许。阿布赉准备一万贸易马匹的举动，充分说明其现实贸易需求，为其后清哈百年绢马贸易活动的开展做好了铺垫。乾隆帝在随后制定的对哈萨克政策中延续了此次通使形成的良好印象，这为双方百年和平关系奠定了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傅恒撰：《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收于《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1年。

［3］《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4］佐口透著：《18—19 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凌颂纯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5］厉声、石岚：《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 年。

［7］野田仁、小沼孝博：*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Kazakh Sultans to the Qing Dynasty*，Central Eurasian Research Special Issue 1，Tokyo：University of Tokyo，2010。

The First Diplomatic Contact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KazakhKhanate

GUO Wenzhong（Department of Histor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gwzwesley@126. com）

Formal contact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Kazakh Khanate started in the mid – Qianlong period. This article uses Manchu archives stored in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s the core material in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historical resources，to analyze diplomatic contacts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leader of the left branch of the Kazakhs，Abulai，and major leaders of the right branch of the Kazakhs，to demonstrate tha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he Kazakhs showed their willingness to submit to the Qing Dynasty by sending envoy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s changing policy towards Kazakh.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previous studies，most of which agree on th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Qing Dynasty and Kazakh Khanate began in 1755. This paper advances new arguments on the specific timing of the submissions of left branch of the Kazakhs，right branch of the Kazakhs submitted to Qing Dynasty，the identities of specific envoys，and the desire of Abulai and his realistic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submission to the Qing.

学术专论

美国“大土耳其”号来华贸易考辨

王　睿

［摘要］1786 年赴粤的“大土耳其”号，是继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的第三艘商船。“大土耳其”号来华并非预期的计划，而是在“中国皇后”号的激发以及英国钳制贸易的格局下，美国海商由好望角向印度及东南亚转向促成的贸易事件。本文挖掘中外文档案文献，考察了“大土耳其”号广州贸易情形，并对某些记述及历史遗留物进行了辨正。

［关键词］“大土耳其”号　早期中美贸易　广州十三行　丙官
［中图分类号］K249.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1－0039－09

船只之于海洋，恰如骆驼之于沙漠。由海路开启的早期中美关系，自不应忽略往来其间的贸易商船。18 世纪晚期，随着北美大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中国与美洲的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生的美国羽翼未丰，却雄心勃勃，在独立后第二年即派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从此开辟了中美之间直接通商的历史。除“中国皇后”号外，尚有数十艘商船亟待研究，1786 年自美赴粤的“大土耳其”号（Grand Turk）就是其中之一。①研究这些商船的意义在于，通过挖掘船只背后蕴藏的丰富史实，能将仅具统计意义的船只数量鲜活化，从而为飘忽浩淼的海上丝路史提供系统完整的文献依据，与此同时，还能消除后起之帝国主义侵华思维模式对早期中美交往研究中“一刀切”的不良影响，从而有效弥补 1784 年至 1844 年间中美关系研究的不足。

“大土耳其”号是继“中国皇后”号之后，前往广州贸易的第三艘美国商船。在美国历史上，共有四艘以“大土耳其”号命名的木制帆船，1786 年前往广州的，是四艘中的第一艘。本文即以 1786 作为时间关节点，运用相关史料，对这艘船的赴粤始末予以考述，同时连带解决几个重要问题。

一、“大土耳其”号的私掠前身

第一艘“大土耳其”号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塞勒姆（Salem）市的船业大亨伊利

［收稿日期］2015－10－20
［作者简介］王睿（1982—），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十三行研究中心讲师，广州 510006；wrnone@ 163. com

① 有关“大土耳其”号的广州贸易，记载最详尽的莫过于罗伯特·E·皮博迪编著的《“大土耳其”号航海日志》，书中材料主要采自“大土耳其”号主人，伊利亚斯·哈斯克特·德比的商业信函以及商船的航行日志;这些材料目前都保存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菲利普斯（Phillips）图书馆。此外，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麦基（Richard H. McKey，Jr.）1962 年的克拉克大学博士论文《麻萨诸塞州塞勒姆商人：伊利亚斯·哈斯克特·德比,1739—1799》、《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山茂召少校日记》以及范岱克的《广州—澳门日志，1762》都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